

· 比较论坛 ·

# 民粹主义如何影响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

——来自欧洲 31 个国家的经验证据

冯国强 孙 瑞 张新然

**内容提要:**文章基于 2009~2017 年欧洲 31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兴起对执政党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民粹主义的流行程度达到 29%~33% 时,右翼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会发生转变,从贸易开放转向贸易保护,但当左翼政党执政时,这种贸易政策的转变趋势并不显著。就民粹主义动因的潜在影响而言,与由社会文化因素导致的右翼民粹主义相比,经济因素导致的左翼民粹主义更容易裹挟执政党,扭转其贸易政策选择。进一步研究发现,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对执政党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并不会因为一国的资本—劳动比这一禀赋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于禀赋条件的影响因素。这对于我国研判对外贸易的政治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民粹主义 政党偏好 贸易政策 后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22)02-0145-13

## 一、引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在欧洲再度兴起<sup>①</sup>。这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一直存在于欧洲各国的政治体系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Kessel, 2014)。当主流政党脱离公民控制却又合法地掌握国家权力时,其民意代表功能大为削弱。政党代表性断裂和代表功能萎缩催生了各种社会组织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民粹主义政党借此与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代理民众诉求,成为冲击主流政党传统地位的一股力量(Caramani, 2017; 汪晖, 2014; 高春芽, 2020)。与 20 世纪末拉美地区兴起的民粹主义相比,本轮民粹主义浪潮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民主国家,从而打破了学术界已有的认识,即民粹主义不再只是“弱制度”国家的产物,且与一国的财富水平也不存在直接联系。那么,民粹主义的兴起对原有的政党体制会带来怎样的冲击? 这种冲击又会如何作用于执政党的贸易政策决定?

对于一国贸易政策选择,经典的理论解释是:在特定政治偏好的影响下,执政党会基于政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结合国内资本—劳动比这一禀赋条件来选择贸易政策(Dutt & Mitra, 2005)。然而,这种静态政治偏好的经典解释无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即主流政党虽然可以不去关注民粹主义改变主流政党利益偏好的可能,但它们却能通过影响选票来打破主流政党轮换的秩序,从而导致原来的利益偏好在贸易决策中难以发挥作用。有研究认为,民粹主义会促使主流政党短期内采取提升贸易壁垒的策

**作者简介:**冯国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候选人。张新然,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sup>①</sup> 瑞典智库 Timbro 发布的《民粹主义指数报告》(The Populism Index: Measuring a Growing and Transforming Force in Politics)表明:2019 年,在欧盟 27 个成员国当中,有 11 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或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占整个欧盟成员国的 40%;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整个欧洲得票率最高的 55 个民粹主义政党中,有 39 个在 2000 年之前就已经建立。这说明,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参见网站 <https://populismindex.com/>。

略来实现收益的再分配,从而使后者不调整政治偏好以巩固自身利益(Rodrik,2018)。以此推断,在大选年前后,主流政党在贸易政策选择上会发生短暂改变。然而,这一研究以拉美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经验为基础,并且设定主流政党只会在大选年前后迎合民粹主义来争取选民支持,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经验事实并不吻合。而且在实证研究中也发现,即便控制政党/集团利益的变量,同时设定民粹主义受欢迎程度在大选年与间隔年之间存在一个衰变周期,依然能发现主流政党在间隔年也存在调整政治偏好的可能。

此外,本文还关心传统的贸易理论尤其是经典的H-O框架是否会干扰民粹主义对主流政党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民粹主义对执政党贸易决策的约束力能否游离于资本—劳动比这一经典假设之外,成为独立的决策变量,以及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各国的禀赋结构是否继续发挥作用。为此,本文利用欧洲31个国家<sup>①</sup>2009~2017年的经验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对上述问题的进行探索。

##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 (一) 民粹主义兴起与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操作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遭受重创,南北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也随之愈演愈烈。这种冲突最大的表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一贯主张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发达经济体却由全球化的引领者变为“逆全球化”的倡导者(董琴,2018;佟家栋等,2020)。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Database of Global Trade Alter, GTA)提供的新增贸易壁垒数量可以发现,2008年以来,全球围绕商品、技术和服务贸易新增的管制措施对贸易总额的平均覆盖率保持年均23%的增速,其中又以OECD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设置的壁垒占主体,其平均增速超出非OECD国家约5个百分点(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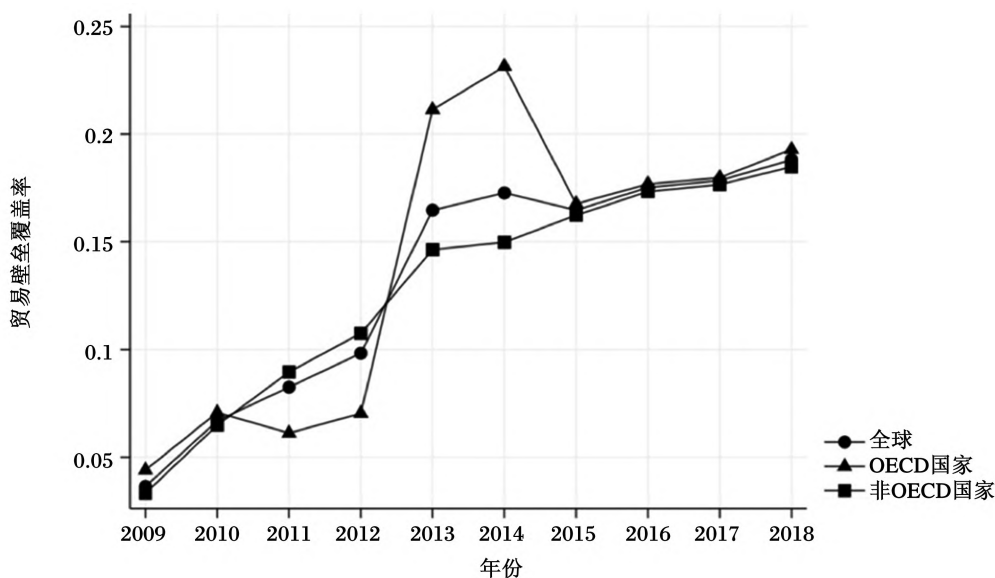


图1:全球新增贸易壁垒平均覆盖率(2009~2018年)

与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操作平行的是民粹主义在北美和欧洲的大范围兴起。瑞典智库Timbro发布的TAP指数(The Timbro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dex)表明,2008年以来,全球民粹主义指数从危机前的

<sup>①</sup> 研究样本集中在西欧,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除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外,其余国家均为OECD成员国。

15.3% 攀升至 2019 年的 23%, 年均增速为 3.5%, 民粹主义政党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水平。同时, 右翼民粹主义要比左翼民粹主义更受欢迎, 这与 20 世纪拉美地区左翼民粹主义的流行形成了鲜明对比(见图 2)。民粹主义的兴起已不只是一股社会思潮, 更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 影响着全球的政治与经济格局。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操作, 其中也掺杂着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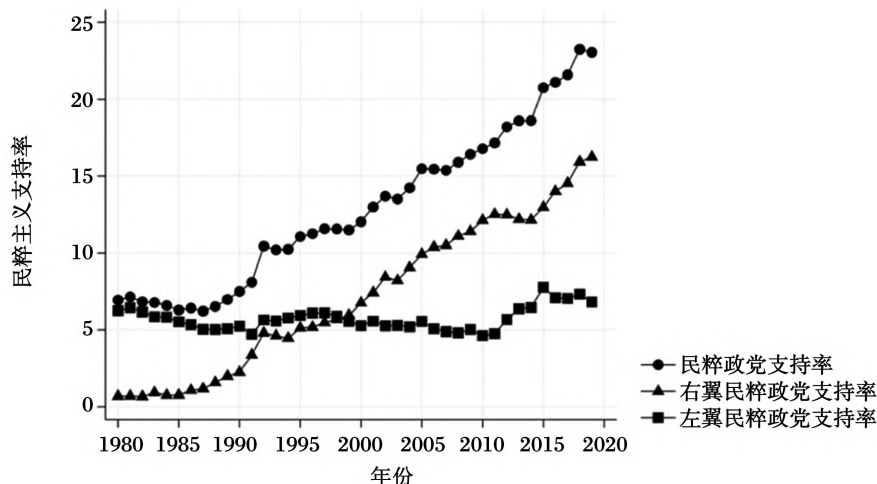


图 2: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1980 ~ 2020 年)

## (二) 文献回顾: 贸易政策选择的理论逻辑

无论是经典的斯密—李嘉图模型、H-O 模型, 还是战后的新贸易理论, 都主张国家基于自身经济运行特征, 包括禀赋结构、技术特征、规模报酬等展开贸易, 推动经济全球化 (Krugman, 1991; Melitz & Ottaviano, 2008)。但事实上, 国家之间的贸易从来不能脱离政治因素的制约,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 对政治因素的考量会远超经济效率。

斯托尔帕和萨缪尔森 (Stolper & Samuelson, 1941) 基于 H-O 框架认为, 为了保护本国劳动者利益, 资本密集型国家存在对进口的劳动要素密集型商品提高关税的激励。琼斯与沙因克曼 (Jones & Scheinkman, 1977)、尼亚里 (Neary, 1978) 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 H-O 框架, 从贸易利益的国别分配角度证明国家存在提高贸易壁垒的行为激励。依此分析, 无论是出于保护本国劳动者利益的目的还是确保贸易利益分配的目的, 政府只需从经济意义上的成本—收益进行权衡进行决策就可以了, 国内政治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发挥作用, 但这显然无法解释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操作 (Rodrik, 2018)。

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选择理论将政治决策过程纳入贸易政策选择的分析中, 弥补了上述研究的不足。这类文献多以政党竞争为出发点, 借鉴中间选民定理的单峰偏好假设, 在 H-O 模型或特定要素模型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强调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和政治献金的影响; 另一类强调多数表决规则下中间选民趋同在贸易政策选择时的作用。在这种解释模型中, 对于资本或劳动要素的供给者而言, 执政党并不存在对某一供给方独特的寻租动机与游说能力, 而是拥有相对静态的政治偏好, 即在维护代表选民利益取向上始终保持稳定。也正如此, 这类解释模型与现实中的政党竞选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 政策选择只能视为无中间选民趋同或利益集团影响的结果。

无论是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 还是中间选民趋同干预的政策选择, 都设定主流政党为代表性组织, 出于构建普遍共识和回应利益群体的诉求来制定政策 (Katz & Mair, 1995)。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 新闻传媒的大众化和网络化大幅提升了非利益集团选民的组织动员能力, 集体行动成本也大幅降低, 民众因而能够广泛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同时, 政党国家化带来的同质性政治偏好与代表性缺位, 使非利益集团选民参与政治过程的诉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从而转向支持组织动员和诉求回应能力相对较高的民



粹主义政党(Roberts, 2020)。因此,仅仅从设定好的主流政党政治偏好来理解贸易政策选择,无法完全解释危机之后民粹主义在国家贸易政策选择中的作用。

就非利益集团如何影响贸易政策而言,欧洛克和泰勒(O'Rourke & Taylor, 2006)发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会“绑架”政府的贸易政策选择:如果工人在贸易中受益,政府就倾向于促进自由贸易,否则将提高贸易壁垒。斯切夫和斯劳特(Scheve & Slaughter, 2004)发现,经济全球化对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质量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工人产生了“经济不安全感”,他们也成为左翼民粹主义兴起和贸易干预政策的重要支持者。除此之外,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导致那些即便在经济上未遭受冲击的保守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转而支持民粹主义政党,进而影响了执政党的政策选择(Rodrik, 2018)。依此分析,民粹主义也会成为非利益集团群体的代表,对主流政党选择贸易政策施加制约。阿西莫格鲁等(Acemoglu et al., 2013)通过构建贝叶斯博弈模型,描述了民粹主义对主流政党政策选择的影响机制,弥补了经典贸易选择理论中对政党偏好静态假定的不足,提出政党的初始偏好会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但该研究假定执政党中立的初始偏好,虽符合主流政党趋向中间选民的规律,但与现实中左右翼政党仍然存在偏好差异的现象不符。因此,该框架也无法推断当给定主流政党不同政治偏好时,民粹主义政党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并且该模型未能提供相关经验证据。

###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为了检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力量如何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抉择,本文利用2009~2017年欧洲3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设置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Barr_{it} = \beta_0 + \beta_1 Ideo_{it} + \beta_2 Ideo_{it} \times Tap_{it} + \beta_3 Tap_{it} + Control_{it} + \eta_i + \z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  $Barr_{it}$  为  $i$  国  $t$  年的贸易政策选择。衡量一国贸易政策常用的指标包括关税、贸易依存度等。而本文涉及的国家很大一部分是关税水平接近的欧盟成员国,通过关税水平无法进行因果识别。此外,经济体量和对外依存度会共同影响进出口贸易价值,经济总量越大的国家越有可能设置更多的贸易壁垒,因此,研究也排除了贸易依存度这一指标。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操作手段变得更加隐蔽,贸易壁垒更为技术化,传统的测度方式已经无法有效描绘贸易壁垒呈现的新特征,加上统计口径上存在的测度误差会影响估计质量。因此,本文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Database of Global Trade Alter, GTA)提供的贸易壁垒覆盖率来反映国家的贸易政策选择,其中记录了自2008年9月以来全球188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实施的贸易壁垒措施导致的双边商品贸易额的变化,并据此测算国家的贸易壁垒覆盖率。其计算公式为:贸易壁垒覆盖率=受贸易壁垒影响的年贸易额/年总贸易额。比值越大,说明该国设置了越多的贸易壁垒。

$Ideo_{it}$  是执政党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用于反映其政治偏好。该数据来自 ParlGov 数据库(Parliaments and Governments Database),其中收录了欧盟和大多数 OECD 国家执政党的政治光谱信息( $Ideo1$ ),并从0到10进行取值,取值越大说明该执政党的右翼特征更为鲜明,取值越小则说明该执政党更加靠近左翼。此外,我们还根据该数值是否超过5来设置虚拟变量,以此来捕获执政党的政治偏好( $Ideo2$ )。当光谱值小于5时, $Ideo2$  取值1,表示执政党为左翼政党,否则取值0,代表由右翼政党执政<sup>①</sup>。

$Tap_{it}$  是民粹主义的活跃程度。民粹主义的活跃程度可以通过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民意支持率以及大选中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来衡量。相比政党数量和民意支持率,大选中的得票率更加客观,能够反映政党的真实影响力(Rodrik, 2018)。本文采用 Timbro 发布的 TAP 指数来衡量。考虑到民粹主义政党同样有左右之分,回归分析当中进一步区分了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为了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对大选间隔年的 TAP 指数进行插补:(1)计算两次相邻大选年的 TAP 指数的增长

<sup>①</sup> 这样一来, $Ideo1$  与  $Ideo2$  取值大小所表示的政党偏好刚好相反。

率,用来拟合间隔年民粹主义活跃程度的增长/衰变过程,以此插补间隔年的民粹指数。此时,分别用  $Tap_{it}$ 、 $Rtap_{it}$ 、 $Ltap_{it}$  表示所有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受欢迎程度;(2)用上一大选年的 TAP 指数表示获胜政党执政期间(间隔年)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此种方法下,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分别用  $_Tap_{it}$ 、 $_Rtap_{it}$ 、 $_Ltap_{it}$  表示。研究根据第一种插补方法进行基准回归,利用第二种插补方法进行稳健型检验。

$Ideo_{it}$  与  $Tap_{it}$  的乘积反映了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通过扭曲政治偏好对贸易政策选择带来的影响。 $Control_{it}$  是一系列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 $kl\_ad$ )、失业率( $Uemp$ )、进口增速( $Impr$ )、贸易赤字( $Tr\_deficit$ )、贸易渗透率( $Pene$ )等。此外,参照已有研究(Giuliano & Tabellini, 2020; 林雨晨、席天扬, 2020),本文还将欧洲社会调查(ESS)数据库中民众对于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评分( $Cul$ )和民众对贫穷国家移民的态度评分( $Eco$ )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 (二) 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文中资本—劳动比采用 Penn World Table 数据库提供的每万名工业从业人员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来表示,失业率、进口增速、贸易赤字情况、贸易渗透率等数据均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arr$	贸易政策选择	279	0.13	0.12	0	0.43
$Tap$	民粹主义支持率	279	0.2	0.15	0	0.68
$_Tap$		279	0.19	0.15	0	0.7
$Ltap$	左翼民粹支持率	279	0.06	0.1	0	0.42
$_Ltap$		279	0.06	0.09	0	0.45
$Rtap$	右翼民粹支持率	279	0.13	0.14	0	0.68
$_Rtap$		279	0.13	0.14	0	0.7
$Ideo1$	政治偏好	279	5.81	1.77	2.62	8.68
$Ideo2$		279	0.33	0.47	0	1
$kl\_ad$	资本—劳动比	279	178.79	90.8	27.44	439.24
$Unemp$	失业率	279	0.09	0.05	0.03	0.26
$Impr$	进口增速	279	0.01	0.15	-0.39	0.39
$Tr\_def$	贸易赤字	279	1.36	4.76	-10.31	12.48
$Pene$	贸易渗透率	279	0.43	0.2	0.19	0.9
$Cul$	国民对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	252	5.46	0.95	3.0	7.28
$Eco$	国民对贫穷国家移民的态度	252	2.55	0.37	1.75	3.46

由表 1 可知,贸易政策选择的均值为 0.13,最大值为 0.43,说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逆全球化操作处于较高频率,平均贸易壁垒的覆盖率为 13%,最高时达到了 43%。从标准差和最大值上能够推断,欧洲内部也存在差异,各国执政党未必会选择相似的贸易政策。政治偏好的均值为 5.81,表明多数国家政党政治偏好处在政治光谱的中心地带,主流政党具有向中间选民倾斜的政治偏好。

表 2 的相关系数矩阵能够进一步直观反映变量的关联程度。其中,TAP 指数与贸易壁垒之间呈现统计上的正相关关系。其他变量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回归模型无须顾及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精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民众对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评分与左翼民粹主义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与贸易壁垒相关系数接近于 0,因此,将其作为工具变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上述推断仅为相关性分析,因果联系还需要严谨的计量检验。

表2: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i>Barr</i>	<i>Tap</i>	<i>_Tap</i>	<i>Ltap</i>	<i>_Ltap</i>	<i>Rtap</i>	<i>_Rtap</i>	<i>Ideo1</i>	<i>Ideo2</i>	<i>kl_ad</i>	<i>Impr</i>	<i>Pene</i>	<i>Tr_def</i>	<i>Uemp</i>	<i>Cul</i>	<i>Eco</i>
<i>Barr</i>	1															
<i>Tap</i>	0.18	1														
<i>_Tap</i>	0.13	0.96	1													
<i>Ltap</i>	0.11	0.45	0.39	1												
<i>_Ltap</i>	0.11	0.41	0.40	0.96	1											
<i>Rtap</i>	0.11	0.78	0.78	-0.22	-0.20	1										
<i>_Rtap</i>	0.06	0.75	0.79	-0.24	-0.22	0.98	1									
<i>Ideo1</i>	-0.03	-0.00	-0.00	-0.07	-0.06	0.05	0.05	1								
<i>Ideo2</i>	0.02	-0.01	-0.02	0.05	0.05	-0.05	-0.06	-0.92	1							
<i>kl_ad</i>	-0.03	0.05	0.03	0.38	0.35	-0.21	-0.20	0.08	-0.09	1						
<i>Impr</i>	0.08	0.00	0.01	-0.07	-0.06	0.04	0.05	0.09	-0.08	-0.02	1					
<i>Pene</i>	0.03	0.08	0.09	-0.27	-0.25	0.28	0.27	-0.02	0.00	-0.35	0.15	1				
<i>Tr_def</i>	-0.00	0.01	0.03	-0.18	-0.17	0.14	0.15	0.09	-0.09	0.30	0.06	0.05	1			
<i>Uemp</i>	0.12	0.11	0.08	0.44	0.41	-0.20	-0.19	0.00	0.03	0.09	-0.01	-0.12	-0.33	1		
<i>Cul</i>	-0.00	-0.39	-0.38	-0.49	-0.47	-0.06	-0.07	0.12	-0.14	0.03	0.03	-0.18	0.35	-0.28	1	
<i>Eco</i>	0.02	0.40	0.41	0.28	0.26	0.24	0.24	0.04	-0.04	-0.16	-0.03	0.33	-0.35	0.31	-0.77	1

## 四、回归结果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研究首先单独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并控制单向的个体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3第(1)(2)栏。考虑到共同的外生冲击,在单向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增加了个体的时间变化趋势。同时,为了处理模型自带的异方差,以及由于解释变量持续性影响产生的组内序列自相关问题,研究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替代传统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得到表3第(3)栏的估计结果。引入控制变量,同时控制时间与个体双向固定效应并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得到表3第(4)栏的估计结果。

表3:基准回归结果

	(1) <i>Barr</i>	(2) <i>Barr</i>	(3) <i>Barr</i>	(4) <i>Barr</i>	(5) <i>Barr</i>	(6) <i>Barr</i>
<i>Tap</i>	0.3914*** (0.1007)	-0.2729 (0.1849)	-0.1779** (0.0802)	-0.2181* (0.1131)	0.1632* (0.0926)	0.1935* (0.1092)
<i>Ideo1</i>		-0.0343*** (0.0076)	-0.0166*** (0.0058)	-0.0164*** (0.0054)		
<i>Tap</i> × <i>Ideo1</i>		0.0166*** (0.0058)	0.0500*** (0.0172)	0.0564*** (0.0173)		
<i>Ideo2</i>					0.0511** (0.0220)	0.0553** (0.0208)
<i>Tap</i> × <i>Ideo2</i>					-0.1607* (0.0834)	-0.2258*** (0.0715)
<i>Control</i>	NO	NO	NO	YES	NO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	N	Y	Y	Y	Y
N	279	279	279	279	279	279
R <sup>2</sup>	0.0577	0.1317	0.7489	0.7608	0.7468	0.7615

注: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第(1)至第(4)栏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不控制任何因素时,民粹主义的兴起能显著提升一国的贸易壁垒水平;交互项估计系数符号显著为正,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符号相反,说明民粹主义与执政党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交互效应。引入控制变量之后拟合优度提高,基本结论仍然成立。政治偏好 *Ideo1* 的系数显著为负,符合杜特和密特拉(Dutt & Mitra, 2005)的推断,即政治立场越靠右的政党,执政期间的贸易壁垒越低;但加入交互项系数以后显示,随着民粹主义受欢迎的程度提高,这一负效应参数绝对值将逐渐减小并不断接近0,存在由负变正的可能,这将在边际效应分析部分作进一步讨论。

对于31个样本国家而言,根据平均政治偏好和估计参数可以测算出民粹主义与政治偏好之间的交互效应,为 $0.0564 \times 5.81 = 0.3277$ ,加上负的直接效应0.2181,得到民粹主义对贸易壁垒的总效应为 $0.3277 - 0.2181 = 0.1096$ 。这表明,民粹主义对执政党贸易政策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其活跃程度每提高1单位,贸易壁垒覆盖率提升0.1096单位。结合贸易壁垒和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的取值范围,可以利用平均统计量更加直观地表达这一估计结果:当民粹主义支持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贸易壁垒覆盖率提高1.1个百分点;当民粹主义支持率从0.2增加至0.3,会导致贸易壁垒覆盖率由0.13提高至0.14,上升7.69%。可以推断,民粹主义兴起会促使欧洲国家的执政党们选择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增设壁垒来拉拢国内非利益集团选民的支持。

当然,上述结果是按照连续型的 *Ideo1* 估计的结果,还可以使用离散型 *Ideo2* 代理执政党的政治偏好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第(5)(6)栏。其中,第(5)栏未引入控制变量。由于 *Ideo2* 的取值方向与连续型政治偏好 *Ideo1* 刚好相反,因此, *Ideo2* 和交互项的估计参数也会与采用 *Ideo1* 时的估计参数相反。估计结果表明,直接效应和交互效应作用相反,民粹主义对贸易壁垒带来的总效应仍然为正,再一次印证了上文的分析结论。

##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检验估计结论的稳健性:一是根据第二种测度民粹主义受欢迎程度的结果,用来替换基准回归当中的第一种测度方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第(1)栏;二是利用工具变量来处理模型设计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参考已有研究,选择移民冲击的代理变量来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见表4第(2)(3)栏。

第一种方法的估计结果显示,除直接效应不显著外,交互项与政治偏好都有较高的显著性,参数符号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模型设定对于数据填补方法的差异并不敏感,基准回归模型是稳健的。

本文的内生性问题源自三个方面:一是民粹主义的活跃度本质上是不可观测的,使用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作为代理变量只能一定程度上测度一国民粹主义的活跃度,因此存在测量偏误的可能性。二是由于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体现在本研究中表现为贸易冲击本身是民粹主义尤其是左翼民粹主义受欢迎的一个原因,而贸易冲击又会影响到一国最终的贸易政策。因此,前期的贸易政策与民粹主义受欢迎程度之间呈现双向因果关系。三是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变量遗漏问题。许多影响贸易政策的因素与同期特定贸易状况、宏观经济政治状况相关,而这些因素难以观测并反映在模型当中,如利益集团带来的影响等。利益集团通过寻租和政治献金等获得特定产业保护,从而可以不必利用民粹主义政党而对贸易壁垒施加影响,而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对主流政党所施加的影响也有可能激起更多的民粹主义情绪。因此,如果遗漏了共同影响贸易政策选择和民粹主义的这一因素,会导致模型的外生性假定不被满足。

利用工具变量是化解内生性常用的办法。已有文献认为,西欧国家民粹主义支持率的上升是由外来移民问题所致(Giuliano & Tabellini, 2020),林雨晨和席天扬(2020)的研究也证明了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会导致民粹主义兴起,并且与贸易冲击相互分离。基于上述观点,我们从欧洲社会调查中选择各国民众对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评分(*Cul*)和对贫穷国家的移民态度评分(*Eco*)测量移民冲击,将其作为民



粹主义的工具变量,以解决模型自带的内生性问题。

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评分(*Cul*)衡量了民众的排外情绪,这种情绪正是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动因。虽然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并不直接与排外情绪相联系,但是他们为了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争夺选民,也会制定类似纲领,因此,这一变量和左翼民粹主义活跃度之间也高度相关,能够间接衡量整体民粹主义活跃度。另外,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与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冲击和利益集团对贸易决策的影响无关,和贸易壁垒的水平也没有直接关系,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条件。在通过两阶段估计之后,我们采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LIML*)进行内生性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第(2)栏。

为了考察移民冲击的相关变量外生性是否稳健,研究进一步利用民众对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Cul*)和对贫穷国家移民的态度(*Eco*)构造工具变量向量组,以此同时捕获移民对本国带来的文化冲击和经济冲击。考虑到此时外生性矩条件大于内生变量个数,因而采取两阶段广义矩估计(*two-step GMM*),估计结果见表4第(3)栏。其中,*Hansen J*统计量值为0.236,*p*值为0.88,因此没有充分理由拒绝外生性原假设,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和基准模型的方向一致,说明即便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基准回归的结果依旧稳健。

表4:稳健性估计结果

	替换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	
	(1) <i>Barr</i>	(2) <i>Barr</i> <i>IV LIML</i>	(3) <i>Barr</i> <i>IV GMM</i>
<i>_Tap</i>	-0.1574 (0.0957)		
<i>Tap</i>		-0.6071* (0.3596)	-0.1856 (0.1635)
<i>Ideo1</i>	-0.0143** (0.0059)	-0.0134*** (0.0033)	-0.0199*** (0.0049)
<i>_Tap × Ideo1</i>	0.0405** (0.0197)		
<i>Tap × Ideo1</i>		0.0585* (0.0343)	0.0668*** (0.0206)
<i>Control</i>	YES	YES	YE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279	252	252
R <sup>2</sup>	0.7452	0.8302	0.8440

### 五、民粹主义作用的边际效应分析

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显示了民粹主义对贸易政策选择存在两方面的影响,分别是 $\beta_3$ 和 $\beta_2 \overline{Ideo}_i$ 。我们可以通过绘制边际效应图来进一步揭示民粹主义如何作用于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图3显示了在政治偏好不同时民粹主义流行程度对贸易决策带来的边际效应。其中,左图是连续型政治偏好时民粹主义对贸易政策选择的边际效应,右图是离散型政治偏好时民粹主义的边际效应。

连续型政治偏好的边际效应图表明,当*Ideo*越小,即执政党左翼倾向更加明显时,民粹主义对贸易壁垒的边际效应越不显著;相反,*Ideo*越大,民粹主义越容易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选择。当*Ideo* = 3.6时,民粹主义的边际效应由负数转为正数,到5.9时则呈现出10%水平上的正向影响。而右侧离散型的边际效应图进一步印证上述结论:在执政党为左翼政党时,民粹主义活跃程度的边际影响不显著,且接近0;当执政党为右翼政党时,民粹活跃度的边际影响在8%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以发现,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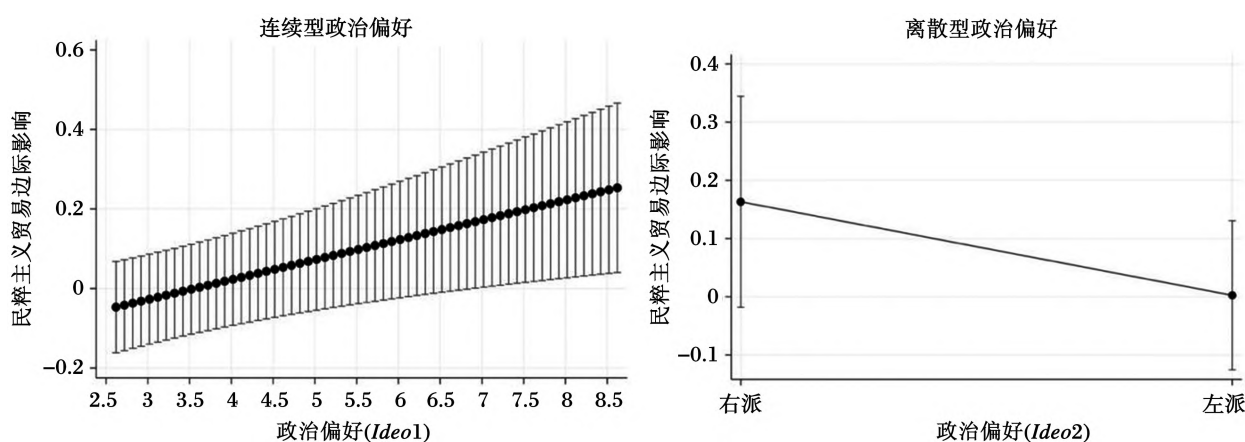


图3:民粹主义对贸易政策的边际效应分析

粹主义对贸易壁垒的正向作用存在异质性,受执政党的政治偏好影响,它对左翼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作用不显著,对右翼执政党的作用显著。

既然民粹主义对贸易决策的影响会因执政党左翼、右翼的政治偏好而呈现出异质性,且主要改变右翼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那么,民粹主义兴起是否会改变右翼执政党原有的贸易政策偏好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进一步以民粹主义指数为横轴,绘制边际效应图来分析民粹主义兴起如何扭转执政党的政治偏好。考虑到离散型政治偏好时民粹主义效应不满足可导连续性,我们只考虑连续型政治偏好下的边际效应,如图4所示。左图为未引入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图,右图加入了控制变量来保证稳健性。结合边际效应图测算,当民粹指数在29%~33%前后,政治偏好对贸易壁垒的边际效应由负数转为正数,说明此时民粹主义能够扭转执政党的政治偏好,由贸易开放转向贸易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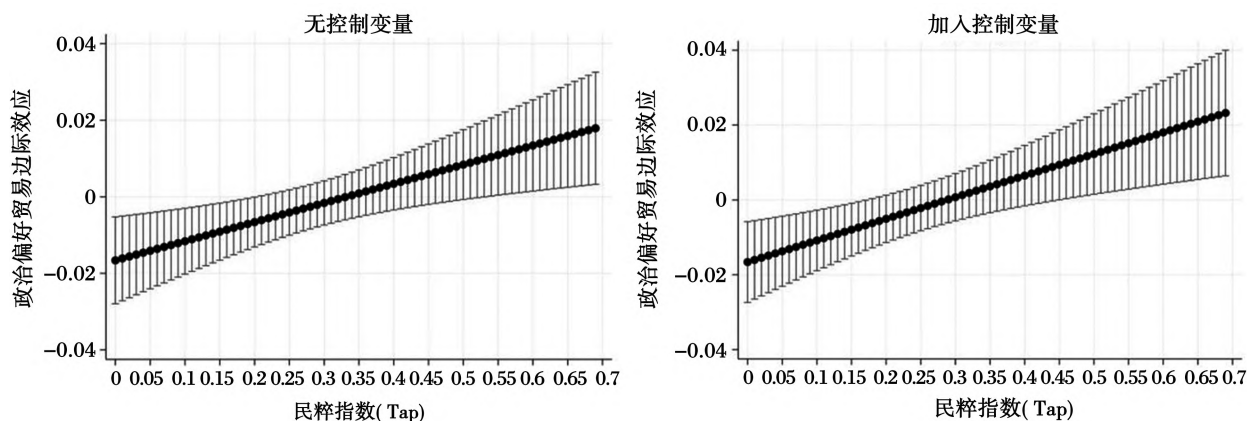


图4:民粹主义扭曲政治偏好作用的边际效应

## 六、民粹动因与禀赋条件的异质性影响

### (一) 民粹主义动因的异质性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民粹主义在贸易政策议题上与左翼政党构成平行关系,而与右翼政党构成竞争关系,这符合政治学中的一般观点,即民粹主义在经济议题上更偏向左翼执政党(Rodrik, 2018)。并且当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就能扭转执政党的政治偏好来影响其贸易政策选择。然而,上述结论并未对民粹主义的动因进行分析,所以只能得到一个呈现差异化的经济现象,却无从理解背后的作用机制。为此,我们将民粹主义兴起的动因纳入分析中,进一步揭示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决策背后的

解释机制。

相关研究中通常将民粹主义分为由经济动因引起的左翼民粹主义和由文化动因引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我们分别将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纳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5。表5第(1)(2)栏的估计结果表明,仅仅由经济动因引起的民粹主义,会导致执政党提升贸易壁垒( $-0.1828 + 0.0588 \times 5.81 > 0$ ),而由文化冲击引起的民粹主义对执政党贸易决策的影响不显著。当然,两种动因可能会同时存在,为此,我们将两种民粹主义一起纳入回归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3)栏。当两者同时纳入模型时,左翼民粹主义的活跃度依旧显著,而右翼民粹主义的活跃度并不显著,这再一次证明左翼民粹主义更容易裹挟执政党,进而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经济动因是影响贸易决策的关键因素。

表5:引入民粹主义兴起动因的估计结果

	(1) <i>Barr</i>	(2) <i>Barr</i>	(3) <i>Barr</i>
<i>Ideo1</i>	-0.0113** (0.0045)	-0.0086* (0.0048)	-0.0166*** (0.0059)
<i>Ltap</i>	-0.1828* (0.0932)		0.1940** (0.0940)
<i>Ltap</i> × <i>Ideo1</i>	0.0588** (0.0248)		-0.0663** (0.0252)
<i>Rtap</i>		-0.0580 (0.2999)	-0.2089 (0.2875)
<i>Rtap</i> × <i>Ideo1</i>		0.0180 (0.0385)	0.0416 (0.0374)
<i>Control</i>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279	279	279
R <sup>2</sup>	0.7472	0.7396	0.7501

考虑到样本中由文化动因诱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活跃程度高于左翼民粹主义,这是否意味着在这波民粹主义浪潮中,右翼民粹主义对执政党选择贸易政策毫无作用?事实上,即便右翼民粹主义与贸易壁垒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仍可以利用文化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来扭曲经济议题,把民族、国家问题从文化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一旦如此,即便一国大部分劳动者并未从贸易当中受损(即无严重的左翼民粹主义表现时),也会导致贸易壁垒的抬高。因此,虽然右翼民粹主义的统计意义上的作用不显著,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经济议题上不发挥作用,只是作用方式更加间接和隐蔽。

## (二) 禀赋条件对民粹主义作用机制的影响

为了回应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与贸易的政治经济理论中对资本—劳动比如何影响政党贸易政策选择的相关解释,研究进一步检验了资本—劳动比是否会成为影响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借鉴汉森(Hansen, 1999)的做法,设置如下静态面板门槛模型:

$$Barr_{it} = \eta_i + \beta_1' x_{it} I(kl\_ad_{it} < \gamma) + \beta_2' x_{it} I(kl\_ad_{it} > \gamma) + \alpha Tap + e_{it} \quad (2)$$

式(2)中  $x_{it}$  是政治偏好 *Ideo* 与交互项 *Ideo* × *lrtap* 组成的向量矩阵,资本—劳动比 (*kl\_ad*) 为门槛变量,  $\gamma$  为未知门槛,  $I(\cdot)$  为指标函数,  $\eta_{it}$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  $e_{it}$  为随机扰动项。

杜特和密特拉(Dutt & Mitra, 2005)在理论与实证上都证明了资本—劳动比会调整执政党在贸易政策选择中的政治偏好:在资本富足型的国家,右翼政党上台后会更加支持贸易开放政策;而在劳动富裕的国家,右翼政党上台后则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本研究中的样本多数为资本富足的 OECD 国家,平均

资本—劳动比达到 178.78, 远高于 84.16 的全球均值; 同时, 样本中资本—劳动比 10% 的分位数为 71.14, 高出全球 50% 分位数 26.13, 5% 分位数水平才和全球 50% 分位数接近。因此, 资本—劳动比这一禀赋条件不具有明显变异性, 其对政治偏好的调节作用在本研究的样本当中可以忽略。

但这一禀赋条件是否会通过影响民粹主义的兴起, 进而影响执政党进行决策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参照汉森(Hansen, 1999)的做法, 可以根据回归得到的最小残差平方和来确定真实门槛值, 测算出在不引入控制变量时资本—劳动比的门槛值为 163.77, 引入控制变量后门槛值变为 179.018, 且均未通过门槛效应检验。在不引入控制变量时门槛效应检验的  $p$  值为 68%, 引入控制变量之后  $p$  值为 57%, 皆显示无充分概率拒绝“无门槛效应”的原假设。这表明, 资本—劳动比对本文所揭示的民粹主义—政治偏好交互机制没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因此可以推断, 就样本覆盖的 31 个欧洲国家而言, 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贸易决策的机制并不会因一国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而改变。

表 6: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值	F 值	P 值	10% 显著性水平	5% 显著性水平
无控制变量	163.77	16.129	0.68	34.79	41.285
有控制变量	179.018	14.368	0.57	29.413	31.541

注:  $p$  值与显著性临界值均为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300 次得到的结果。

由于样本国家之间要素存在着跨国异质性, 而每万名工业从业人员所拥有的资本存量( $kl\_ad$ )无法反映这一异质性特征, 这可能导致上述门槛效应的检验失效。考虑到人力资本数量可以视为异质性劳动的一种测度方式, 因此可以借鉴霍尔和琼斯(Hall & Jones, 1999)的做法, 引入人力资本来调整资本—劳动比, 以此消除要素跨国异质性对检验结果产生的影响。具体做法是, 先用各国劳动力人数乘以 Penn World 9.1 数据库中按霍尔和琼斯分段函数测算的人力资本的自然指数, 得到利用人力资本调整之后的劳动力总和<sup>①</sup>; 然后以此为分母、物质资本为分子, 计算出调整之后的资本—劳动比; 最后将调整之后的资本—劳动比带入模型(3)进行门限估计<sup>②</sup>。调整后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7。结果表明,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仍然无充分概率拒绝“无门槛效应”的原假设。这说明在考虑要素的跨国异质性之后, 表 6 得到的分析结论仍然成立, 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的贸易决策不受禀赋条件制约。

表 7: 调整要素异质性之后的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值	F 值	P 值	10% 显著性水平	5% 显著性水平
无控制变量	0.597	14.62	0.717	34.317	50.44
有控制变量	0.483	11.34	0.7167	27.593	32.132

##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 31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民粹主义兴起会显著影响一国的贸易政策选择, 民粹主义受欢迎程度越高, 执政党越倾向于采取逆全球化操作, 提升贸易保护程度; 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选择主要出现在右翼政党执政期间, 对左翼政党执政期间的作用不明显, 当民粹主义的流行程度一旦达到 29% ~ 33%, 扭曲作用变得显著; 在 2008 年以来发

① 具体计算公式为:  $H = L \times G$ ,  $G = e^{\phi(s)}$ ,  $H$  为调整后的劳动力数量,  $G$  为人力资本权重,  $s$  为不同的教育年限,  $\phi(s)$  为人力资本指数, 也就是 Penn World 9.1 数据库所用的霍尔和琼斯分段函数。 $\phi(s)$  计算公式如下:

$$\phi(s) = \begin{cases} 0.134 \times s & ifs \leq 4 \\ 0.134 \times 4 + 0.101 \times (s - 4) & if 4 < s \leq 8 \\ 0.134 \times 4 + 0.101 \times (s - 4) + 0.068(s - 8) & ifs > 8 \end{cases}$$

② 我们还根据调整后的人均资本存量代入模型(1), 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说明考虑要素跨国之间的异质性以后, 仍不改变本项研究的分析结论和推断。

达国家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经济冲击带来的左翼民粹主义更容易裹挟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民粹主义裹挟贸易决策的机制并不会因一国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而出现异质性特征,民粹主义与禀赋条件之间彼此互相独立,共同作用于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

本文印证了国内政治会影响贸易政策的观点(Grossman & Helpman, 1992),并认为当政党利益最大化与选票最大化发生冲突时,政党会为了争取更多选票而调整原有的政治偏好,这一规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反弹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结论打破了经典文献中对政党偏好所作的静态假设(Dutt & Mitra, 2005; Gawande et al., 2009),也发展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投票者理论(Ward et al., 2011)。当然,限于样本约束,研究仅关注了欧洲的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对于北美、澳洲的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国家能否适用,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在对欧贸易中,我们应密切注意右翼政党执政期间的民粹主义动向,一旦出现政策和政党偏好偏离的势头,需提前启动贸易风险防范机制,减少贸易损失。还要留意民众对民粹主义的支持倾向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变化,有效研判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出台激进政策的可能性,提前适度防范。此外,还应关注受中东及阿富汗局势影响进入欧洲的难民数量、结构、迁移路线以及当地民众对移民和难民的态度和回应,以更全面地理解欧洲民粹主义支持率的变化,以此为依据合理调整贸易策略,降低民粹主义对我国对欧贸易的冲击程度,减少波及范围。

#### 参考文献:

- 董琴, 2018: “‘逆全球化’及其新发展对国际经贸的影响与中国策略研究”, 《经济学家》, 2018, 12: 91—98。
- 高春芽, 2020: “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 《政治学研究》, 2020, 1: 101—111。
- 林雨晨, 席天扬, 2020: “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自进口贸易和难民冲击的影响”, 《经济学(季刊)》, 2020, 4: 1191—1212。
- 佟家栋, 何欢, 涂红, 2020: “逆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开启”,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 1—9。
- 汪晖, 2014: “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 《开放时代》, 2014, 2: 70—79。
- Acemoglu, D. G., Egorov, and K. Sonin, 2013. “A 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2): 771—805.
- Caramani, D., 2017. “Will vs. Reason: The Populist and Technocratic Form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ir Critique to Party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1): 54—67.
- Dutt, P. and D. Mitra, 2005. “Political Ideology and Endogenous Trade Polic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7(1): 59—72.
- Gawande, K., P. Krishna, and M. Olarreaga, 2009. “What Governments Maximize and Why: The View from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3): 491—532.
- Giuliano, P. and M. Tabellini, 2020. “The Seeds of Ideology: Historical Immigration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7238.
-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1992. “Protection for Sale.” *NBER Working Paper*. No. 4149
- Hall, R. E. and C. I. Jones, 1999.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 83—116.
- Hansen, B. E., 1999.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93(2): 345—368.
- Jones, R. W. and J. A. Scheinkman, 1977. “The Relevance of the Two-sector Production Model in Trade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5): 909—935.
- Katz, R. S. and P. Mair, 1995.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1): 5—28.
- Kessel, S., 2014.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reat or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2(1): 83—85.
-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3): 483—499.



- Melitz, M. J. , and G. I. Ottaviano, 2008.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5 (1) : 295 – 316.
- Neary, J. P. , 1978. “Dynamic Sta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Factor – market Distor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8 (4) : 671 – 682.
- O’Rourke, K. H. and A. M. Taylor, 2006. “Democracy and Protectionism.” NBER Working Paper. No.12250.
- Roberts, J. C. , 2020.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in the US: New Media and the 2018 Arizona Senate Primary.”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8(1) : 111 – 121.
- Rodrik, D. , 2018.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1) : 12 – 33.
- Scheve, K. and M. J. Slaughter, 2004.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 : 662 – 674.
- Stolper, W. F. and P. A. Samuelson,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1) : 58 – 73.
- Ward, H. , L. Ezrow, and H. Dorussen, 2011. “Globalization, Party Positions, and the Median Voter.” *World Politics*. 63 (3) : 509 – 547.

## How Does Populism Affect the Ruling Party’s Trade Policy Cho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31 European Countries

Feng Guoqiang<sup>1</sup>, Sun Rui<sup>2</sup> & Zhang Xinran<sup>1</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2.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By employing a panel data of 31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Europe from 2009 to 2017, this paper uses a two – 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test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populism on the trade policy choice of the ruling party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We find that once the popularity of populism reaches 29% to 33% , the trade policy caused by political ideology of right – wing parties will be distorted from trade openness to protection, while i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eft – wing ruling parties. Compared with the popularity of right – wing populism caused by cultural factors, the prevalence of left – wing populism caused by economic shock is more likely to coerce the ruling party to make choice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echanism of populist kidnapping trade decision – making does not show heterogeneous influence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the endowment condition of a country’s capital labor ratio, but an independent factor of the trade policy choice. The inference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to reduce the political risk of foreign trade.

**Key words:** Populism; Party Ideology; Trade Policy; Post Financial Crisis

(责任编辑:王 瑶)